

论 1500 年至 1800 年间中国货币的来源

——以闽商为核心

陈娜娜

(福州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3)

[摘要] 1500—1800年间, 通过以闽商为核心的海外贸易, 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白银的大量涌入, 促使白银逐渐替代铜钱和纸币成为中国流通领域的新主角。这一时期, 活跃于世界贸易市场的闽商, 成为中国货币的主要来源之一, 支撑了明清时期的经济繁荣。同时, 闽商的一系列活动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明清世界白银; 闽商; 白银影响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563(2014)05-0092-04

自 1565 年(明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了第一个亚洲殖民据点后, 世界贸易史上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篇章: 欧洲——南美——菲律宾——中国福建的大帆船贸易。16 世纪 40 年代, 西属美洲发现了蕴藏丰富的银矿, 由此美洲白银开始涌入古老的非洲和欧亚范围的金银市场。从此, 闽商除了通过“大帆船贸易”将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之外, 同时也把当时世界上第二大产银区——日本的白银输入中国。这些新增的白银不仅对中国, 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明清时期中外货币的演变

在中国的历史上, 白银从贵金属逐渐取代铜走向完全的货币化, 是在明朝时期。明代中叶后, 土地兼并剧烈, 地权高度集中, 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 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 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针对这种现象, 不少人主张赋役改革。那时, 国家从保证赋役出发, 逐渐在全国推行了一条鞭法, 将徭役赋税大部分摊入地亩, 人们通过缴纳银两就可以解决赋役问题。这时人地开始分离, 白银开始货币化。明代的一条鞭法, 清代继

续施行, 到乾隆时通行全国, 摊丁入亩后, 地丁合一, 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这一系列的措施更加促进了白银的货币化。

明初和清初, 多年的农民大起义和朝代的更替, 经济萧条。两朝统治者采取各种政策来鼓励生产发展, 商品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明代, 南京“北跨中原, 瓜连数省, 五万辐辏, 万国灌输, 天下南北商贾争赴。”据乾隆《潮州府志》卷 14《墟市》, 潮州府揭阳县在康熙时才有 5 个墟市, 到乾隆时已发展到有 25 个墟市, 称作“逐日市”, 每天的商业活动频繁, 人来人往, 十分繁荣。以这些大小城市、市镇和集市为纽带, 形成了全国性的商品贸易网络。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劳动力本身也逐渐具有了商品性质。而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实施, 使劳动力挣脱了土地的束缚, 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

在繁荣的市场交易中, 白银逐渐取代铜钱和纸币被广泛使用, 而成为主要的等价物。正如马克思所说: “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 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 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

收稿日期: 2014-10-20

作者简介: 陈娜娜, 女, 湖北随州人。

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1]

而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就是一个“贫银国”,明代之前,在中华大地广泛流通的货币不是银两,而是化学性质稳定、不易锈蚀、可长期保存和流通的铜。白银的稀缺,导致白银在当时多作为贮藏、装饰之用。此时,白银的需求量大量增加,白银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进入流通领域,最终来到中国呢?

我们首先要谈到当时的欧洲。“欧洲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制造业落后,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差强人意,需要仰赖中国丰沛的物产。中国幅员的广阔与人民的智慧几乎提供了前工业革命时代人民生活所需的一切……”^[2],欧洲人想要获得中国丰富的商品,就不可避免的要拿出可以和中国的商人进行交换的货币或者商品。可是,当时的欧洲没有什么物品能够卖给富饶的中国。而作为欧洲货币的黄金,在与中国商交易中并没有比白银更具价值。16世纪40年代,哥伦布的大航海发现了美洲蕴藏丰富的银矿,欧洲通过殖民和掠夺,获取了大量的白银。

弗拉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曾这样说到“任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存储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品。……生产、销售和买卖货币与生产、销售和买卖其他商品一样能够产生利润,甚至更容易,更有利!”^[3]因此,他在文中总结到,欧洲人将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大部分白银运往中国,日本人将自己生产的比美洲多三倍甚至十倍的白银出口给中国,以获得中国的丰富的物产。因此,全世界白银之外超过一半以上的货币最终流转到了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

由此,欧洲将从美洲获得的大量白银运往亚洲与中国的商人交换他们所需的商品,并将从中获取的巨额利润用来支持他们在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地与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贸易。当然,他们也用这些贵金属来买卖其他各种商品,也与闽商一样在亚洲的各地进行这些商品的交易。

大量白银的涌入,促使银币在明朝成为正式货币,元宝、碎银和银元成为清朝法定货币。

二、以闽商为核心的货币贸易

对于巨额白银资本流入中国这个问题,弗兰克在《白银资本》的第三章中指出:16世纪中期至17

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7000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而中国学者全汉升的研究结论是:1571年至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流入了中国。相比较而言,弗兰克的估计比全汉升保守多了,即便如此,短短一百年间,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的手段流入中国,也十分令人震惊了。

那么按照弗兰克的观点,货币从海外输往中国,并通过与中国贸易,流入中国市场。在那个海禁政策严厉执行的年代,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杰出商人——闽商。在当时,闽商早就在亚洲各地区的贸易中发挥着翘楚的作用,亚洲各地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市场!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是寄生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农是本、商为末,在朱元璋以及之后历代统治者眼中,除了小农经济的农业文明之外,根本没有海洋文明的影子!那个时代,以闽商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人民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自由流动的海洋被国家的律法所禁,跨进海洋就等于和家与国对立!但是内陆与沿海由于生存、生产条件的不同,民众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手段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却只允许生活在不同区域的民众只能采取一种生存方式与生产形态。此种制度的腐朽性与反人民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严厉的海禁政策排挤之下,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商只能采取各种“扭曲”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生存需求:冒充各国贡使,利用各种“朝贡”机会进行贸易;私自泛洋、武装起来与统治者周旋。以福建为中心的沿海,海洋“走私”活动与日俱增。沿海人民无视法禁,明朝人冯璋有言:“泉漳风俗,嗜利通番。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

1522年,葡萄牙人被赶出广州之后,沿海岸北上,在福建、浙江沿海寻找合适的贸易点。仅在漳州一带就形成了有相当规模的三大走私港:梅岭、浯屿、月港。以中国东南沿海岛屿为商业据点,是西方

商业扩张势力接近中国沿海,与滨海民众交易的重要手段。由此,一是方便与中国内地民众交易,并便于把交易的货物迅速转运往其他地方。二是可以发挥海上优势,力求进退自如地避免与明朝军队正面交锋。

以闽商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民众的商业天性是无法扼杀的。他们代表的是当时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民间力量;这种行为无意中鼓励了欧洲人的商业冒险行为,于是一个“走私”据点被消灭,又诞生了另一个“走私”据点。中国民间海商与欧洲商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商贸热情和“犯禁”行为令封建统治者头疼不已。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海禁,宫廷内部的海外物产资源奇缺,社会所能流通的贵金属也相当有限,在这种内外压力的作用之下,明政府终于作出了在他们看来最有利于统治的妥协:有限度的、可控制的开港!以此来保证一定的海外贸易活动。明政府最终选择一个不是十分合适的港口——福建漳州月港。

从此,闽商的海外贸易由不法的走私成功迫使政府承认为合法的、官方允许的活动,在那个海禁严厉的时代,为中国海外贸易打开了端口。为之后白银的大量涌入,形成以闽商为核心的白银贸易网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白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随着美洲金银(主要是白银)以及日本白银和铜通过闽商的贸易活动注入世界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新的流动形态和信贷形态。而这又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出现明显的、急剧的增长。这些增长满足了新的货币注入的需求,推动了欧洲、中国、印度等地的发展。

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向我们详细的论证了白银的输入对亚洲和欧洲的不同影响结果。

(一)对物价的影响

弗兰克从费雪方程式 $MV=PT$ 即货币(Money)数量乘以流通速度(Velocity)等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Price)乘以其生产和销售的交易量(Transactic。))的角度谈到,货币计量学设定,如果货币数量增加,而流通速度和交易量不变,那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应该随着货币的增加而相应地上涨。在16世纪,新的美洲货币进入欧洲,于是价格上涨了。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欧洲的价格上涨,以及价格实际上涨

了多少,是在什么时候上涨的?弗兰克在考察了多位学者的观点之后,认为杰克·戈德斯通(1991a,b)的观点最具说服力:“欧洲(除西班牙之外)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人口和需求的增长导致的,而不是由新的美洲货币供应造成的。”^[4]

在亚洲,会不会也存在通货膨胀呢?首先弗朗克列举了大量学者的考察结果,论证印度的物价上涨至多是个别现象,仅限于个别地区和个别商品。除了17世纪中期外,印度实际上没有通货膨胀。其理由是,产出和流通速度的增长吸收了货币供应的增长。

他同时也论证了,中国与印度的情况一样。生产和人口都增长了,但新增的货币并没有使物价的上涨速度大大地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马克斯以及他与沈春生发现,甚至在高度货币化的中国南方,除了个别短暂的米价飞涨时期外,在许多世纪里,米价的上涨是与人口增长紧密相关的,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则倾向于下降。另外,他们引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来证明:“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物价昂贵时减少生育,在物价便宜时增加生育。”因此,“如果说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根据经济形势来调节他们的生育,那么人口的增长……很可能是对经济增长中的重大进展的一个直接反应。”

(二)对拓殖和生产扩张的影响

上述有关物价的史实和讨论支持了一个论点:货币的涌入在亚洲既刺激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也刺激了商品生产的供给。

弗朗克提到,货币的涌入在亚洲既刺激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也刺激了商品生产的供给,更大层面上促进了拓殖和生产的扩张。新的货币供给,尤其是来自美洲和日本的货币供给,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支持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

在印度的孟加拉和比哈尔被莫卧尔帝国征服和兼并后,它们是生产扩张最明显的地区(Richards 1987:5)。实际上,从1657年到1714年,虽然有大量的白银从国外流入,但与印度其他地区相比,孟加拉的物价比较低,而且一直比较稳定(Prakash 1994:V-165)。如果货币供应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引起物价的相应上涨,那么其原因应该是,货币供应的流通速度是随着经济的逐渐货币化而增快了,生产的总量增加了。因此,生产的扩张应该主要归因

于印度人经营的内销市场和出口市场实现了某种结合。

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马克思引述当时一位总督的论断:“交易皆用白银,白银流通全省。”商人们向农民预付定金(这种资本大概也直接或间接来自出口换得的进口白银),日后收取他们的农产品。马克思作了一系列概括性的描述。其中有一段特别能说明问题:

白银流回中国(作为出口的回报)。……到1600年,这种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丝绸的旺盛需求引发了土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化……(另外)到1700年大约一半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低处种植桑树、棉花、甘蔗和水稻,高处种植玉米和红薯)。

总之,各种迹象显示,新的货币供给,尤其是来自美洲和日本的货币供给,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支持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

1500—1800年间,通过以闽商为核心的海外贸易,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闽商不仅开启了中国与世界的白银时代,对世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大量白银通过闽商经营的贸易网络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对中国国内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近代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 [2]苏文菁.闽商文化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117.
- [3]弗兰克.白银资本[M].北京:中央编译,2008:125.
- [4]弗兰克.白银资本[M].北京:中央编译,2008:147.
- [5]苏文菁,徐晓望.闽商发展史总论卷古代部分[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 [6]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 [7]张国刚,吴莉苇.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从白银资本谈几点看待西方理论架构的意见[J].史学月刊,2002(01).
- [8]郝鹏.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赋役制度改革[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4).

(责任编辑:郑 涵)